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主编

法海一得

业露华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法海一得

业露华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海一得/业露华 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8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主编)

ISBN 978-7-80123-896-2

I. 法… II. 业… III. 佛教-文集 IV. B9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118488 号

法海一得

业露华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1(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戴晨京 袁珂

版式设计: 陶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75 印张 325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80123-896-2

定 价: 38.00 元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禅、





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

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了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年),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年)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 would 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已经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



少见。有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目 录



总 序	朗 宇(1)
北魏的僧祇户和佛图户	(1)
北魏的僧官制度	(13)
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佛教	(21)
论北魏佛教的几个特点	(41)
北魏佛教的历史剖面	(57)
——读《魏书·释老志》	
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概述	(71)
佛教伦理和中国社会	(93)
略论大乘佛教的道德理想	(103)



从《佛说善生经》看佛教的家庭伦理观	(116)
佛教的人生观和道德修养	(135)
中国佛教的善恶观	(152)
从世间的善恶到出世间的善恶	(163)
——佛教伦理思想研究	
略论中国佛教的轮回报应说	(173)
论契嵩的孝道思想	(185)
慧远的佛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97)
六祖慧能的佛性论思想	(245)
拈花微笑	(256)
——禅学起源	
禅苑清规	(281)
——丛林制度	
一花五叶	(297)
——南禅五家	
百丈怀海与中国禅宗之发展	(328)
略论智旭大师的净土著述	(344)
论《安乐集》的净土思想	(353)
道绰净土思想研究	(367)
藕益大师净土思想研究	(382)
印光与《峨眉山志》	(393)
五台山与上海佛教	(400)
唐代五台山普通院	(406)
关于《法华经》的几个问题	(412)

《华严经》思想略探·····	(428)
《华严经》“十地品”概说·····	(446)
《华严法界观门》略论·····	(465)
略论中国近代佛学之复兴·····	(483)
浅议都市佛教·····	(490)



目
录

北魏的僧祇户和佛图户

北魏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而北魏僧祇户和佛图户的创立,则是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事件。

关于僧祇户、佛图户的具体情况,除《魏书·释老志》以外,缺乏更为详细的材料。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作了一些考证和研究,这里想就北魏僧祇户、佛图户创立的原因、实质及其作用,谈点个人的意见。



僧祇户和佛图户约创设于北魏皇兴末年到延兴年间(470—475年)。^①北魏高宗(文成帝)时,沙门统(北魏管理僧务的最高僧官)昙曜奏:

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

^① 见琢本善隆《北朝佛教史研究·北魏的僧祇户和佛图户》。



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①

《资治通鉴》此条后有注曰：“史言魏始割民力以奉释氏。”^②说明北魏朝廷对佛教经济上的支持，作为一项制度，这是开始。

僧祇户最早大多由平齐户转变而来。平齐户即平齐郡民户，亦称“平齐民”。公元467年（北魏献文帝皇兴元年），北魏军队南下，先后攻克宋之无盐（今山东东平以东）、肥城（今山东济州平阴县东南）等地，又引兵攻宋历城（今山东历城）。至468年2月，历城失守，守将崔道固降魏。随后，宋之梁邹城（今山东邹平东北）守将刘休宾亦降魏。崔道固、刘休宾及其僚属被送往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469年，魏徙青、齐两地之民于平城附近，立平齐郡于平城西北北新城。^③以崔道固为太守，下治两县。把梁邹民划为怀宁县、历城民划为归安县。^④

北魏统治者把被征服地区的居民迁往京师附近，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对他们实行监视，防止他们反抗，另一方面则可充实京师人口，有利于开发这一地区。总之，这是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

这就是所谓“平齐户”的来历，他们是僧祇户的基本组成

① 见《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

② 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二。

③ 《资治通鉴》卷一三二，《魏书》卷二十四、五十。

④ 《魏书》卷二十四，四十三。



部分。佛图户的基本组成部分是被判罪的人以及部分“官奴”。

北魏统治者为什么要把这些人组成僧祇户和佛图户呢？这和北魏社会激烈的阶级斗争以及经济状况、佛教发展的趋势等情况有关。

北魏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阶级压迫十分沉重，就拿苛捐杂税来说，史书记载“太安中（455—459年），高宗以常赋之外杂调十五，颇为繁重……。”^①《通鉴》也说：“魏旧制：常赋之外，有杂调十五。”^②可见其赋调是很多的。此外，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情况也很严重。史称魏百官“少能以廉白自立者。”^③太武帝时，大将公孙轨在上党做官，刚去时“单马执鞭”，离任时却“从车百辆，载物而南”。^④这样的事情翻开《魏书》看一下，比比皆是。

沉重的租调，贪暴官吏，压得人民透不过气来。处于异族统治之下的平齐民，更身受阶级和民族的双重压迫，命运更为悲惨。当时大官僚高允，历任要职，但其姻亲多有平齐户。史书说：“显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于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离饥寒……”^⑤高允的姻戚亦是世家望族，然而即使这样也免不了“流离饥寒”的遭遇，那么一般平齐民的生活就更艰难了。如一旦遇上荒年，社会就会剧烈地动荡。“是时，频岁不登，郡

① 《魏书·食货志》卷一一〇。

② 《资治通鉴》卷一三二。

③ 同上。

④ 《魏书》卷三十三。

⑤ 《资治通鉴》卷一三六。



内饥弊。道固虽在任积年，抚慰未能周尽，是以多有怨叛。”^①统治者所实行的以汉族人治汉族人的政策也未能奏效。在这沉重压迫之下，广大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抗。他们有的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有的舍弃本业，离乡背井；或亡命山泽，渔猎为生；或投仗强豪，寄命依食；此外便是投奔寺院，“绝户而为沙门”，^②以求生路。

面对这种情况，北魏统治者一面进行镇压，一面则利用宗教这一工具来加强对劳动人民思想上的统治。

南朝宋文帝曾经毫不隐讳地说：“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指佛教），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③封建统治者是很懂得如何利用宗教的。当然北魏统治者亦不例外。早在北魏建国初期，就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佛教了。魏太祖拓跋珪在平定北方时，命令军队保护各地寺院，并且向沙门致以敬意。他还亲自致书送礼给泰山和尚僧朗。^④太宗明元帝时，佛教正式为北魏统治者负起了“敷导民俗”的责任。“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⑤当时北魏正进行着统一北部中国的战争。在进行征服、掠夺的战争之后，需要对各被征服民族进行劝化和安抚，佛教适应了这一需要，得到了北魏政权的高度重视。所以高宗即位以后，对佛教采取了更加支持赞助的政策。

① 《魏书》卷二十四。

② 《魏书》卷五十三。

③ 《弘明集》卷十一。

④ 《广弘明集》卷三十五。

⑤ 《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

他下令诸郡县,凡是人口聚居的地方都可以建立寺院,任其消耗资财,不加限制;居民中有愿出家为沙门者,不问老少都听其出家。^①

可见在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之时,统治者为缓和这些矛盾,避免进一步激化,以求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充分利用佛教这个工具为其服务,就必须给予佛教一定的支持。在此时创设僧祇户、佛图户,正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给佛教提供稳固的经济资助。

僧祇户、佛图户是由当时沙门统昙曜提出创设的。昙曜,《释老志》说他“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太武帝灭佛时,沙门纷纷还俗,但是昙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谕,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②高宗即位,下诏复兴佛法,公元460年,昙曜继师贤而任沙门统。北魏佛教就在此时进入了兴盛的阶段。462年,昙曜于北台石窟寺召集了一批僧侣,主持翻译佛经工作。“庶使法藏住持无绝。”^③这对北朝佛经流通及佛教传播,是很重要的。闻名于世的云冈石窟,也于此时开凿。不仅如此,此时还大兴土木,修建许多宏伟壮观的寺塔佛像,寺院数量和僧尼人数也迅速增加。太武帝灭佛后三十余年,到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魏境已有寺院六千五百多所,僧尼将近八万。^④要维持如许僧人的日常生活及规模浩大的寺院工程,必然要求寺院



① 《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

② 同上。

③ 见《大唐内典录》卷四。

④ 见《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